

建设现代文明公认的规范致富机制

□陆震

近年来涉及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论著不少,但从总体上看,“述”比较多,“思”比较少,具体而微的局部描绘比较多,整体性深入探索比较少。王义祥先生的新著《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也还是描述性的,但全书脉络清晰,观点明确,材料翔实,要言不烦,全面回顾了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在人口、婚姻家庭、社会阶层、农村、城

市、政治结构、经济体制、思想文化、教育体制、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的变迁,新选用的材料近至2006年,颇具中国近30年来社会变迁史略的意味。

而依笔者浅见,面对与“黄金机遇期”并存的“矛盾高发期”和“危机凸现期”,迫切需要我们对中国当代社会变迁以及这种变迁的未来走向,作些本源性的思考。至少应该能言之成理地说服我们自己;在经历了近30年

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面对的为什么是GDP快速上升社会却矛盾重重的怪异世相?

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以疾风暴雨的方式,实现了由“道德时代”、“名节时代”向“利益时代”、“求富时代”的转变。看起来,这个转变似乎顺理成章甚至顺乎民心,但实际上正是这个转折,将中国社会引入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利益时代”在中国的骤然降临,其关键原因是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误读误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民贫国弱”,国家体制则不是个问题,至少不是根本性问题。作为一种社会共识,中国大多数人至今仍未明白,民贫民穷并不是历史上历朝历代因治理不当所导致的问题与缺陷,而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社会目标,是他们所固守的人治体制的体制目标,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卿相晏婴。他在《晏子春秋》中提出了有名的“温饱治国论”,意谓对老百姓,不可让其饥寒,否则会不听话,但也不可使其饿着,饿了他会造反。自此以后,贫民弱民就成为中国整个社会体制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生活体制的基本取向和重要取向,与之对应的是使老百姓惧怕财富、惧怕致富和抑制致富、打击财富。即使到了1949年以后,也只提倡国家富强而不允许个人与家庭致富。对此,鲁迅先生了然于胸,曾在“在中国安贫乐道是治国的大经济”一语宣示了历代统治者和中国整个社会体制的死亡。“安贫”就是老百姓安于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乐道”就是甘于“存天理、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
 王义祥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12月出版

灭人欲”,奉行三纲五常,体制中的“贫民弱民”取向由此转化成了堂而皇之的首道德取向、名节取向。几千年来,社会体制与安贫乐道之间的高度融合与循环强化,一方面使体制在面对贫穷的民众时十分强大,另一方面,也使得体制几乎完全不具备对财富的应对能力,面对个人致富的浪潮,面对财富的引诱、腐蚀与冲击,这个根本没有考虑过个人致富为何物,不知道如何引导、规范个人致富,不知道如何驾驭、掌控财富的体制,肯定是世界上最为脆弱、最易解体的体制。

果然,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竖起了允许、鼓励民众致富的大旗后,改革开放很快演进成一场以金钱财富为目标和目的的迅猛进军。社会整体性、全方位地求富、重富、荣富、护富,致富成为个人的立身之道、家庭的立家之道和国家的立国之道。国家和社会以所有的方式、力量鼓励社会成员致富。人们的一切活动都首先为了个人致富、家庭致富以及国家致富和社会致富。财富与致富成为社



会、国家更是家庭与个人的首要取向、首要价值和根本目的。更出人意外的是,致富浪潮引出了颂富、荣富的意识形态漩涡,社会几乎有了“谁发财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的评价,致富与财富不仅成为地位与力量的象征,而且具有了道德上“善”的含义,致富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道德行为,是个人生活、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以至根本性的善。

这样一种亘古未有的社会大转折大变迁来得这么自然,这么迅速,而实际情况表明,问题远不止贫富分化这一点。以个人致富为最高取向的社会浪潮从根本上瓦解了我们这个社会体制原有的目标体系,无可避免地被财富浪潮腐蚀、同化,松散成各式各样的组织碎片。把个人致富道德化,又抽空了我们这个社会体制的灵魂,道德之善与理想之善已不敌财富之善,我们的社会体制不但无法规范致富与财富,而且也不具备去规范的体制品性、体制结构和体制能力,因为我们已在整个世界上罕见地把经济、生产力、GDP、财富的增长发展提升为了天下最大的善。

这里,我们看到了“利益时代”在中国骤然降临时我们无力应对的第二个原因:对一个社会的社会取向与社会体制之间的匹配、耦合关系还没有起码的认识,或完全处在必然王国之中。我们还未认真思考过,从几千年传统社会继承下来的体制,与社会的财富取向匹配吗?进一步说,有匹配的可能吗?换句话说,在致富浪潮中出现的诸种问题,比如贫富两极分化、政府自利、官员腐败、特殊利益群体膨胀、民生问题恶化等,在目前这样的社会机制下,是偶然还是必然,是有解还是无解?依笔者之见,怕是后者而非前者。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要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句话的意义了。

在社会取向排序上,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会把致富、财富放在正义之前的。而要把正义摆在第一位,却又不是哪一种体制能真正做得到的。由于人民富裕这面旗帜不可能再降落,个人致富的浪潮不可能再退潮,要完成温总理的“两大任务”,中国现在能做的就是:建设起现代文明公认的、能规范致富和财富的民主法治体制,如此,社会才会因财富而新生。

中国社会变迁正处在这个十字路口。

■ 著译者言

麻雀变凤凰也可能再变麻雀

——评《对冲基金风云录》

□唐岳华

对冲基金经理被华尔街投资界被称为“刺猬”(hedgehog),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行业——对冲基金业(hedge fund)。虽然这样称呼他们是一种巧合,但是他们却如此的相似——辛勤而怪异,迷人而危险,执著而贪婪,在浑身尖刺下隐藏着敏感的内心。在“美国第一投资策略师”巴顿·比格斯大曝内幕的《对冲基金风云录》中,这些“刺猬”们自然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很少有人能像拥有华尔街投资界30多年经历的巴顿·比格斯那样亲历如此之多的起落和变故,见证了只只“刺猬”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投资世界中的悲和喜。自从科技泡沫破灭后,投资成了一项危险的工作,特别是基金。比格斯透视了这些每天都在决定巨额资金投向的人的性格特征和心理,他们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和经营手段,将华尔街特有的商业文化和生存之道演绎得淋漓尽致。

曾担任摩根士丹利首席战略官的巴顿·比格斯是华尔街的传奇投资者与金融大师,他为摩根士丹利公司创立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投行研究部。2003年,他离开摩根士丹利,创立了名为Traxis的合伙对冲基金,如今该基金管理的资金已经超过10亿美元。

众所周知,近年来对冲基金的规模增长迅速,2004年底资产达9720亿美元,基金数量达8000多支,相比1990年分别增长了37倍和12倍。有分析人士预测,到2008年对冲基金资产将达17万亿美元,数量将增至1.2万只。对冲基金的最大特点是其所受的金融监管比较少,基金经理谋求投资策略有较大的自由度。另外,在1%至2%的基金管理费之外,一般来说对冲基金经理的报酬直接与业绩相关(通常有10%至20%的业绩分成)。因此,对冲基金经理们尤其重视投资策略的选择。其实,整体对冲基金业的关键其实就是这些被称为“刺猬”的对冲基金经理。于是,想要增加对整个对冲基金运作的认识和了解,就得走进刺猬们,看看各式各样的刺猬们的生活。

虽然刺猬们投资生活复杂而惊险,但是本书的投资故事却引人入胜。原来,在对冲基金经理们高度紧张的生活里,酒窖、西部滑雪屋、知名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和共享直升机,都是缺一不可的。查查名录可知,他们大部分人拥有显赫的背景,一般沿着安多福(美国著名私立高中非利普斯中学所在地)——耶鲁——哈佛商学院的尖顶路线一路走来。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本书作者。巴顿·比格斯的父亲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职业投资者,曾担任纽约银行首席投资官和多家企业的董事。他于195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英文系,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并于1961年进入华尔街。



《对冲基金风云录》
 (美)巴顿·比格斯 著
 张桦等 译
 中信出版社
 2007年1月出版

然而,“刺猬”生活中心酸而艰辛的一面才是作者真正想揭示的内容,专业投资的复杂与惊险才是本书的真正想阐述的主题。撇开那些具体的投资策略,书中的多个故事自始至终都渗透着专业投资者必须承受的情感折磨:压力、不安、艰辛、变化无常……正如作者所说的,每一个“麻雀变凤凰”的故事背后都隐藏着至少两个“凤凰变麻雀”或“麻雀变凤凰再变麻雀”的故事。作者就向读者袒露了自己抛空石油策略失误后的后悔、创办对冲基金历程中的心理煎熬以及路演过程中百味杂陈的艰难。

人的性格千差万别,刺猬们在投资上的表现自然也千姿百态。有个性安静却热爱高风险投资的蒂姆的成功奇闻,也有善于高瞻远瞩但总爱夸大预测的“胡子先知”文斯的逸事;有对冲基金界的“不落明星”杰克保持20年风光业绩的秘诀,也有《华尔街日报》神奇提示贾德森·托马斯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

巴顿·比格斯喜欢把投资类比作艺术,根据投资信条把投资者分为三大派别:成长型投资者、价值投资者和不可知论者。由于历史数据分析得出价值型投资的表现优于成长型投资的结论,巴顿·比格斯作为一个不可知论者,更偏向于价值投资。而本杰明·格雷厄姆是价值型投资的鼻祖,巴菲特也对此策略推崇备至。

投资与其说是一门科学,倒不如说是一种艺术,尤以对冲基金为然。在竞争惨烈、充满风险、诱惑、艰辛和折磨、只认数字和美元的华尔街投资界,取得成功需要一些特殊的要素:智慧、经验、勤奋、灵活、想象力和强大的预知力,等等。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并不一定能成为一名成功的职业投资者。职业投资者要想成功,至少得对智力竞争怀有喜爱与激情,并能够应对突如其来的压力和逆境;专注和贪婪还不够,还应当真正热爱这场游戏的复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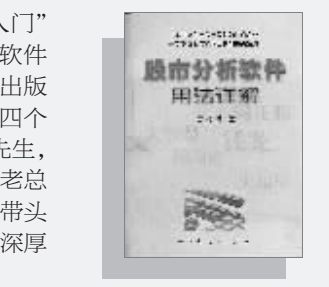
凯恩斯是难得的经济学家和对冲基金经理两种角色的绝妙结合,这个伟大经济学家和对冲基金经理的传奇故事足以使当今对冲基金界的精英们相形见绌。难怪著名金融专栏作家安多福·维金要如此提醒大家,“建议你们在阅读本书之前,先别把钱交给华尔街上的任何人。”

《股市软件分析用法详解》热销

姜金胜4月14日、21日分别开讲并签售

借着牛气冲天的股市,“入门”与“提高”两者兼具《股市分析软件用法详解》今年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后,大受股民欢迎,短短四个月加印四次。该书作者姜金胜先生,既有担任机构操盘手、咨询公司老总经历,又有证券期货专业学科带头人的教学经验,理论与实践均有深厚积累。

趁着最新加印上市之际,本周六(4月14日)上午10点和下周六(4月21日)下午2点,姜金胜先生将分别到福州路上海书城、宜山路515号博库书城举行“股市技术分析讲座”,并签名售书。



繁荣自由之路从职业诚实起步

□胡飞雪

500年来,或者说人类进入近现代以来,欧美列国发展成为富强的国家,为什么中国却没有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对这个问题,中外许多有识之士已给出了各自的解释和回答。英国李约瑟博士的说法是,中国官本位势力强大,科技人员没有地位,读书人不愿从事科技活动,技术很难转化为生产力,并创造出财富。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中国一直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等等,各有所理,都摸到了大象的一部分。这本《资本主义的另一条腿》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相当独特的解释和回答。

本书第一章,作者开门见山,指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精神在于节俭和理性,而节俭和理性,为的是有“本”可“资”,也就是积累足够的本钱,凭着这本钱,再去赚钱。在西方人看来,只要干得合法,赚钱就是职业和能力的结果表现。由此可以说,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体现了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财富观、人生观,而且这种精神和观念,不仅属于世俗,也属于宗教层面。根据新教教义,牟利赚钱,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工种,都是在履行天职,都是荣神益人的虔诚的宗教行为,都是在给上帝以荣耀,

或者说上帝通过个人的行为显示了他无上的荣耀。同时,由于个人事业的拓展,给了更多人就业的机会,个人对社会便是有益的。有这样的人文精神和核心观念,便会顺理成章地发展出两种基本的世俗标准,诚实(对上帝、对自己、对他人)的诚实和敬业。作者在论及这两点时,特别提出,诚实先于敬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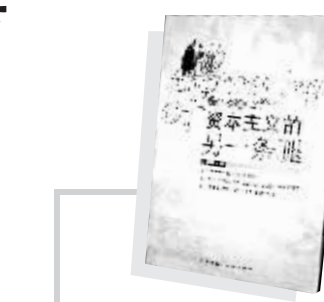
那么主导、决定中国人现实行为的精神逻辑和核心观念又是什么呢?作者指出,亚宗教的不诚实性,是使我们远离资本主义精神的根本原因。所谓亚宗教,即中国主流的儒教,正是儒家的更是官方钦定的主流政治思想的不诚实,使得中国不可能为资本主义的胚胎遗传出诚实和敬业这样两条健壮的腿。

作为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家思想,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把它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起,它的命运,就是被统治者不诚实地对待和利用。汉武帝一生,竭尽全力推行中央集权,晚年虽有忏悔之意,但已改变不了历史的命运。汉武帝歪曲利用儒家思想,尊儒其实是挂羊头,从他是如何对待大儒董仲舒,便可以看出。可叹可恨可哀的是,汉武帝的这种做法,成为后世历代帝王官僚效法的样本,即使是下级小官僚,也深谙此道,擅玩

此术。比如北宋三流政客宋江,他混上水泊梁山第三代领导人之后,高调宣布,他和他管辖的梁山要“替天行道”,他要代表上天的意志,他要代表宇宙唯一的真理,要体现花鸟虫鱼的利益,等等。可是,在台上刚表演完,顾不上喝一口纯净水,他就拉着身边工作人员燕青等,趁着夜色,潜入京城,拜访当时的大明星李师师,恳请李大姐给皇上他老人家传递信号,希望梁山众英雄好汉能被朝廷招安。说中国社会被笼罩在不诚实的重重迷雾中,是不为过的。本书作者由此总结说:“儒家造就的不诚实文化,彻底使资本主义精神失去了在中国的孕育之床。”

在下认为,似乎还可以更完整地表述:帝王官僚(很多就是强盗无赖)借着儒家造就的不诚实文化,彻底使资本主义精神失去了造福中国的机遇。

佛家有前生、际此、后世三界之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不诚实,不仅危害中国前生,也给今天造成了恶果。书中卷第五章“充满道德风险的社”就列出了当今职业伦理败坏的三个方面社会表征:以医德衰败为代表的服务行业横向职业伦理堕落,以垄断行业冷漠为代表的纵向职业伦理灰化和以司法腐败为代表的公义职



《资本主义的另一条腿》
 姜彦臣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年9月第一版

业的伦理沦丧。这种现象如果再任其蔓延,中国似有滑向吴敬琏先生再三警示的“坏的市场经济”的趋势。

本书开出的药方和制定的治疗方案是,重建职业伦理是通向繁荣自由国度的必经之途,配方有个人主义、个体行动、不欺人不自欺、平等合作,以及解毒剂宽容等等。当然这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至于是否偏颇,相信读者心中自有一杆秤。

笔者以为,纵览全书,作者还有另一层意思:如果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关键的少数”理解且也认同、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有关国富民的思想财富的价值和积极意义,并将其转化为行动的力量,中国的后世就将是光明宽广的!

■ 新书过眼

《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德)康拉德·费茨著
 许文敏 李卡宁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7年4月出版

德国驻华大使、当前德国与欧洲最有声望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的这本专著,2000年首版以来已连续再版10次,对于富于理性又注重经济效益的德意志民族,这个记录多少显示了本书的价值和影响力。全书勾勒了600年间中国的沉落起伏,追根寻源,解析今日改革成就,展望明日崛起远景。作者一直在追寻中国的文化之根:为什么自秦王朝以来总是难逃改朝换代之规律?为什么儒家思想能持续数千年?高度文明、发达的宋、明何以游牧民族所取代?明治维新何以在日本成功,而中国却只有“百日维新”?社会主义何以在中国成功?国企改革何以如此艰难?他的提醒值得国人深长思之,邓小平的改革使中西文化在中国出现了罕见的融合,儒家的思想和共产主义一样受到了冲击,接下来怎么办?中国新的文化究竟该以怎样的精神和伦理道德作为基础来建设呢?

《股市稳赚》

The Little Book That Beats the Market



(美)乔尔·格林布拉特著
 李佳 卢晓晖 译
 中信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一位创立了20年间平均回报率高达40%的投资公司对对冲基金经理人,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在本书中通过简单和循序渐进的步骤,向大家提供了一个如何在股市中稳赚的“神奇公式”。这个公式简单、易于理解,利用它可以超越市场、超越专业投资人和分析家。写作本书最初的灵感来自一个愿望:送孩子礼物——教会他们去赚钱。格林布拉特非常自信,投资与专业背景、智力水平都无关,开始投资永远没有太早太晚之说,即使他的概念被广泛使用,还是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有效性。另一位牛人安德鲁·托拜厄斯在序言中调侃说,本书最好的地方是大多数人不会相信书中的内容,既使信了,也不会有耐心照着样子去做。这个调侃会落空吗?

《身份的焦虑》



(英)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著
 陈广兴 南治国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3月出版

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潜藏着对自身身份的一种难言的焦虑:在别人眼里,我是怎样一个人?是个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可少有人真正审视过这种身份的焦虑。年轻的英伦才子型作家德波顿首次引领我们直面这一人心深处的焦虑情结。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发潜能、力臻完美、阻止离经叛道的有害行径,并增强由社会共同价值产生的凝聚力。但承认焦虑的价值,并不妨碍我们同时质疑,人们渴望得到地位和财富,但一旦如愿以偿,生活反而会变得更加糟糕。人的很多欲望总是与自己真正的需求毫无关系。德波顿援引艺术家、思想家及作家的观点与作品,抽丝剥茧般地剖析身份焦虑的根源,并从哲学、艺术、政治、宗教等各个角度探索舒缓和释放这种焦虑的途径。